臺大歷史學報第24期
1999年12月，頁329-374
BIBLID1012-8514(1999)24p.329-374

臺灣史學的「變」與「不變」：1949～1999年

王晴佳*

提　要

本文希圖探討臺灣史學在最近五十年的變化。臺灣史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分成三個時期。從1949年至1960年代的中期為初創時期。其發展受到兩個方面影響：一是與中國近代的史學傳統，特別是所謂「史料學派」保持著密切聯繫。1960年代至1980年代為第二個發展時期，其特點是臺灣史界開始與西方史學產生了比較密切的聯繫，不但有西方史學家來臺灣訪問，也有相當數量的臺灣史家到西方求學並在當地任教，同時又不時回臺「傳道授業」，使得西方史學思潮很快波及臺灣。這一時期的史學潮流，以社會史的興起為主要標誌。

1990年以來至今是第三時期，其主要趨向為臺灣史的興起。這一潮流表現了臺灣民眾希望了解本地歷史的願望，轉而影響到臺灣史界。同時，這一史學新潮又與國際史學的總體傾向合拍，即在突破民族—國家史學的基礎上，從多元的史學觀念出發，重新認識過去。在臺灣，這一史學研究趨向既體現了鄉土情懷，又有重建民族國家的意向，與其他地區相比有其特殊性。

臺灣史學雖然有此發展變化，但變化之中仍有「不變」的因素存在，那便是臺灣史家對史料考證和開發的重視。這一現象使人聯想到「史料學派」的傳統。今後臺灣史家如何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在歷史論述方面有所建設，是臺灣史學進一步發展的關鍵。

關鍵詞：史學　臺灣　臺灣研究　史學史

---

* 作者係Rowan University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落地生根的「史料學派」
二、史學研究的方法論轉向
三、臺灣史的興起
四、餘論

本文希圖利用有限的篇幅，對臺灣史學在最近五十年的變化發展，作一鳥瞰。首先我想對本文的題目和我研究的取徑，做一番解釋。我所謂的臺灣史學，指的是臺灣歷史研究的總體，其含義比臺灣歷史的研究要廣得多，但臺灣史的研究自然也在其中，而且就當前的發展趨勢來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既然我想探討的題目是如此廣泛、時間跨度又很大，就必然有一個題材選擇和研究重點這樣的問題。這些選擇和重點，反映的是我個人的學術興趣和背景，難免有偏頗、不當之處。換言之，本文所反映的是一個關心臺灣史學的局外人的一點觀察，寫出來供各位內行方家批評指正。（爲行文方便，本文不用「先生」、「教授」等尊稱）

具體說來，本文所著重研究的是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臺灣史學與中國大陸史學之間的聯繫。這一聯繫自然有許多方面，也可以劃分不同的時期。但我想側重的是討論臺灣史學的成長與中國近代史學傳統之間的傳承關係，在時間上著重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第二，臺灣史學與西方史學的交流與聯繫。在這一方面，我想以一些史學刊物的創辦及其影響，如《思與言》、《史學評論》和《新史學》等，來考察臺灣史家與西方史學之間的互動、交流，檢討西方史學對臺灣史家，特別是年輕一輩的史學研究者的影響。這些影響也包括西方基金會對臺灣史學研究機構的扶植，如中研院近史所的創辦等等。第三，臺灣史學在臺灣1987年解嚴之後，特別是最近十年的變化與臺灣政治、以及臺灣本土化運動之間的聯繫。自1990年代以來，臺灣史家開始有意識地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對臺灣的過去，尤其是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各種聯繫作了新的探索，由此造成臺灣史的研究成爲史學研究的一個熱點。這一熱點局面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成，不僅表現在臺灣史論著的大量印行，臺灣地方志的編撰，而且也表現在臺灣史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年輕一代的歷史系學生紛紛選擇以臺灣的歷史爲論文寫作的題目，一些原來研究中國史的成名學者也開始轉而研究臺灣史。這一時期的史學變化，似乎最能反映史學與歷史——即臺灣社會、政治和經濟——之間的互動。

依據這三個方面的考察，我以爲臺灣史學的發展，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1949年至1960年代的中期，是臺灣史學的初創時期，其發展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與中國近代的史學傳統，特別是所謂「史料學派」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由於傅斯年的關係，中研院史語所和臺灣大學，成爲臺灣歷史研究的重鎮，其學風被史界同人視爲歷史研究的楷模，並通過教學和出版而影響到新一代的歷史學家。二是冷戰的政治環境，使得當時的臺灣史界有一種復興中華文化的危機意識，以成爲中華文明的正統代表爲己任，使得臺灣史家與中國近代史學傳統之間的聯繫，變得更爲緊密。

從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爲第二個發展時期，其特點是臺灣史界開始與西方史學產生了比較密切的聯繫，不但有西方史學家來臺灣訪問，也有相當數量的臺灣史家到西方求學並在當地任教，同時又不時回臺「傳道授業」，使得西方史學思潮很快地波及到臺灣。這一時期的史界潮流，以社會史的興起爲主要標誌，恰好與西方史學的潮流相符，同時又銜接了中國近代史學的傳統，《食貨》雜誌的復刊及其影響可爲顯證。

1987年以來至今，臺灣史界的主要趨向爲臺灣史的興起。這一潮流自然有其政治因素和社會因素，表現了臺灣民眾希望了解本地歷史的願望，轉而影響到臺灣史界。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一史學新潮又與西方史學的總體傾向合拍，即在突破民族——國家史學的基礎上，從多元的史學觀念出發，重新認識過去。在臺灣，這一過去既有地方、鄉土的關懷，又有重建民族國家的意向，更顯示出它的特殊性和複雜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落地生根的「史料學派」

所謂「史料學派」，起源於中國近代史家傅斯年的一句名言：「近代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後由許冠三加以簡化，成「史學本是史料學」，由此命名其「學派」。但許冠三對史料學派的理解和界定，似乎過於狹隘，也不正確。比如他把傅斯年與陳寅恪歸入同一學派，就不十分妥當。[1]因爲陳寅恪的治學態度和成就，雖有一些爭議，但卻遠非一句「史學等於史料學」的話所能概括。[2]

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始人，並任終身所長二十餘年，直至1950年他的逝世。同時，他又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精神領袖胡適的學生和朋友、五四時期的學生刊物《新潮》的主編和學生領袖。在1927年回國以後，在中國學術界名（權）重一時，抗戰勝利後任北大代理校長，1950年又出任臺大校長。如此種種，使得我們對他的歷史觀，必須有一個廣泛的認識，不能局限於傅本人。[3]換言之，所謂「史料學派」，並不只是傅斯年本人的史學研究所能包涵，而是當時（民國時代）史學主流傾向的一個代表。同樣用「史料學派」這一名稱，余英時對該學派的理解，便要寬泛得多：

>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有兩派：第一派可稱之為史料學派，乃以史料之搜

1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上冊，頁205以降。

2 有關陳寅恪的學術成就，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無法一一羅列。對陳寅恪的治學淵源，他的學生王永興和蔣天樞便有不同的理解。最近《近代史研究》上由於羅志田〈『新宋學』與民初考據史學〉一文所引起的羅與《史家陳寅恪傳》的作者汪榮祖的一場爭論，或許能讓讀者瞭解該方面最新的一些動態。羅文載該刊1998年第1期，頁1~36。羅、汪兩人爭辯的通信載該刊1999年第2期，頁282~292。

3 參見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上卷，頁1~42。有關傅斯年的生平與學術，見王汎森（Fan-shen Wang），*Fu Ssu-nie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稱之為史觀學派，乃以系統的觀點通釋中國史的全程為史學的主要任務。[4]

如此看來，史料學派並非傅斯年史學所獨有，而是整個民國史學中兩個代表性傾向中的一個；另一個則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爲代表。這一理解，更爲精當。的確，自本世紀初梁啓超提倡「新史學」以來，中國近代史學的一個主要傾向便是史學研究的「科學化」，不但希求探索中國歷史演變、進化的通則與規律，而且希望在科學實證的基礎上，注意史料的蒐集、整理與批判。如果說前者的工作由馬克思主義史家所承擔，那麼後者則主要由自由主義史家胡適、傅斯年等人所倡導和付諸實踐。胡適、顧頡剛、傅斯年，加上梁啓超以後的參與，對科學方法做了實證主義的理解，並在此基礎上與中國乾嘉考據史學的傳統相連接，以此來革新、改造中國的史學傳統，重新認識中國文明的演變。[5]

以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所代表的史料學派，在1920至1930年代的中國史學界以及學術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儼然是「科學史學」的正統。[6]他們的主要成就，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認識，即杜正勝所謂的「從疑古到重建」。這一疑古的工作，始自胡適在北大的任教，與五四運動期間的批判傳統思潮有密切聯繫，但主要以顧頡剛所引起的「古史

---

4 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頁2。周予同的論文〈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已經有這樣的劃分方法，見《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朱維錚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514~520。

5 對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史學影響的研究，可見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宣讀於「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研討會」（1995年12月17~18日）。我在該研討會上的論文，也對此有所論述，見王晴佳〈中國二十世紀史學與西方——論現代歷史意識的產生〉，《新史學》，9：1（1998.3），頁55~82。我的英文著作對此有更深入的分析，見*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NY: SUNY Press, forthcoming)。

6 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1995），頁519~574。逯耀東的《胡適與當代史學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對後人瞭解胡適的學術圈子與地位，亦有生動的描述、分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辨」討論爲主要標誌。[7]顧頡剛等人通過對文獻史料的考證，讓人們在科學、實證的基礎上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揭露了以往文人僞造古史的現象。但如果說由於「古史辯」的討論，中國向來引以自豪的五千年文明首次讓人產生了一些懷疑；那麼傅斯年在1927年歸國以後、在開創和領導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時獲得的成就，則讓史料學派的研究路線走上了重建中國古代史的道路。傅斯年對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信仰和他激發、調配學術資源的能力，讓他對中國史學的科學化作出了令人稱羨的貢獻。史語所從1928年開始，連續對殷墟作了十餘次考古發掘，其成果不但證明中國的上古時代有高度文明，而且也直接、間接否定了顧頡剛的「疑古」思想，用實物史料論證了某些古書的真實性。[8]

但是，這一史料學派的傳統到了1930年代的後期，則呈現一種斷裂的趨向，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1937年日本開始大規模的侵華戰爭，使得實證的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如上述對殷墟及其它地方的考古發掘，只能停止。大學及研究機構的搬遷，更使得一般的學術研究，也只能暫告一段落。當時的史家張蔭麟對此情狀有一生動描繪：

> 文獻的淪陷，發掘地址的淪陷，重建的研究設備的簡陋，和生活的動蕩，使得新的史學研究工作在戰時不得不暫告停滯，如其不致停頓。「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英賢，固尚有之；然而他們生產的

7 有關顧頡剛和「古史辨」的討論，見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1987）、陳志明《顧頡剛的疑古思想》（臺北：商鼎出版公司，1993）、劉起釪《顧頡剛學述》（北京：中華書局，1986）、彭明輝《疑古思想與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臺北：商務印書館，1991）、顧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外文的有Laurence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和 Ursula Richter, *Zweifel am Altertum: Gu Jiegang und die Diskussion über Chinas Alte Geschichte als Konsequenz der "Neuen Kulturbewegung, ca. 1915~192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8 有關傅斯年的史學成就，見前引王汎森即將問世的英文著作的有關章節。另見前引杜正勝的〈從疑古到重建〉一文。張豈之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對史語所的考古發掘，有詳細的討論，見頁474以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效率和發表的機會不得不大受限制了。[9]

實際上，即使有心做學問，也無法再以考訂史料的真僞爲宗旨了。傅斯年本人就發出了「書生何以報國？」的疑問，並應急寫了包含許多史料錯誤的《東北史綱》。胡適、傅斯年等人在抗戰期間的主要活動，更多地圍繞著當時的政治生活，而不是學問上的細微、點滴。

第二，雖然史料學派的科學考證曾增加了人們對中國文明源遠流長的認識，但面對日本侵佔東北、進而發動全面戰爭的嚴峻形勢，這一學派的治學路線還是讓人感到有一種遠水解不了近渴的感覺。那時馬克思主義和左翼史家所發動的「中國社會史和社會性質的論戰」，觸及了當時中國社會直接和眼前的問題。[10]相比之下，胡適等人在年輕一代學人的眼裡，已顯得落伍了。[11]至少從他們與年輕學生的關係來看，他們已從青年的引路人變成要他們返回課堂、認真讀書的規勸者。換言之，中國史學界、學術界已經爲以馬克思主義爲代表的左翼激進主義思潮所籠罩。[12]實證主義的史料學派與之相比，大有黯然老去之勢。不少爲傅斯年、胡適等非常賞識的年輕史學家，都逐漸「左傾」。其中吳晗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13]

---

9 張蔭麟「中國史綱上冊自序」，《張蔭麟文集》（臺北：中華叢書，1956），頁445。

10 有關這場論戰的中文論著很多，不再列舉。西文著作主要是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和 Mechthild Leutner,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Politik und Wissenschaft: zur Herausbildung der chinesischen marxist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n 30er und 40er Jahren (Wiesaden: O. Harrassowitz, 1982)。

11 羅志田在其《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中對胡適是否落伍的問題有所討論，頁317~320。

12 余英時對此現象有分析，見氏著"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ed. by Tu Wei-m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5~150。

13 傅斯年曾在吳晗申請材料不全的情況下，將吳列為中基會申請人之甲等，並謂：「手續未備之處，仍乞貴會斟酌。在此次請款各人中，研究能力，無疑以吳君為第一，其他各人相差甚遠」，見傅致中基會信，「傅斯年檔案」，I-271，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對於吳晗的變化，參見潘光哲〈學習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吳晗的個案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是，在國民黨政府1949年「轉進」臺灣以後，這一史料學派則成爲中國近代史學的「正統」，在臺灣的史學界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這裡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這些政治傾向上屬於自由主義的學者，雖然對國民黨及其政權有不滿之處，但認同卻大於不同，因此也相繼追隨來臺，成爲史學界的主幹力量。如長期擔任臺大文學院院長的沈剛伯，便在1948年來到了臺灣，爲傅斯年擔任臺大校長作了準備。[14]而傅斯年出任臺大校長以後，又聘用了不少他所熟悉的朋友和在史語所或者中央研究院的同事，如姚從吾、李濟、毛子水、董作賓、劉崇鋐等。當時的《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950年6月創刊），也聘請傅斯年爲名譽編輯，上述他的朋友爲編委。因此，在臺大和史語所，傅斯年的影響在當時可以說是如日中天。

這種由大陸來臺學者控制臺灣史學界的情形，就局勢而言是十分自然的。雖然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受到了挫敗，但對於二次大戰的戰敗國日本來說，它儼然還是一個勝利者。1945年臺灣「光復」以後，日本人逐漸撤離，臺灣大學的教職員，自然由從大陸撤退、逐漸來臺的學者充任。事實上，臺大那時招收的學生中，也有相當數量來自大陸。如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人類學家李亦園，就在那時從福建孤身來臺應考，進入歷史系，以後才選擇人類學爲專攻方向。[15]另外，許倬雲、林毓生等歷史學家，也曾在大陸接受高中或者初中教育，以後才進入臺灣大學歷史系。

在大陸來臺的學者中，無疑以信奉或同情史料學派的人佔多數。如果我們接受余英時的說法，將1949年以前的史學界大致上分爲「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兩派，那麼很顯然，唯有史料學派的人才會選擇到臺灣，而以馬克思主義爲代表的史觀學派的人物，自然都會留在大陸，「迎接解放」。甚至，即使史料學派的人物中，還是有不少人出於各種原因，滯留大陸，如顧頡剛與一些傅思年親手培養的弟子和史語所工作

《新史學》，8：2（1997.6），頁133~185。

14 參見逯耀東〈『量才適性』的沈剛伯先生〉，《胡適與當代史學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321。

15 李亦園與筆者的談話，1999年4月7日於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同事，如夏鼐、何茲全等人。另有一批人則選擇流亡國外，以胡適爲代表，以後才慢慢找機會到臺灣或者回大陸。

1950年到1960年代中期的臺灣史學界，因此是史料學派的天下；毋須與其它學派爭勝，因爲除此之外並無其它。這一情形可見於兩個方面：首先，從當時發表的史學研究論文來看，很顯然以「考證」、「校補」、「年譜」爲多數，不但史語所集刊是如此，而且也見於上面所提到的《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實際上，在這些刊物上發表文章的就是同一批人，如董作賓、姚從吾、方豪等。其次，這一實證、考據的學風，也反映到歷史系的教學上，因爲在那時臺大歷史系任教的，也還是同一批人。這一實證主義的學風，影響了好幾代臺灣史學家，但是即使在當時，也還是有人對此有所不滿。如現以思想史研究見長的林毓生，就有這樣的評論：

> 臺大歷史系的師資，號稱集過去北大、清華與中大（中央大學）三校史學系教授的精華。但，他們的課程（除了少數例外）大多相當瑣碎，主要是考證史實。考證史實——尤其是考證重大事件的史實，當然有一定的意義與貢獻，這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工作。不過，不是每一事件的考證都有相同的意義。當時臺大史學系的師長們的考證工作，許多失之於屑瑣。然而，他們卻以為學問而學問來辯解他們工作的價值，特別強調追求真理不可滲入世俗的、功利的考慮；並舉科學史上當初看來是瑣碎的研究，後來變成重大發現的例子，來說明他們的工作的意義。我對這樣冠冕堂皇的說辭，心中甚感不安；但當時卻想不出令人信服的論點來反駁他們……[16]

林毓生的回憶，從一個接受者（雖然不太心甘情願）的角度，證明了當時史料學派的影響。

當時史料學派之所以能「一統天下」，除了上述人事上的原因以外，更與當時的政治局勢有著關係，其中包括當時的冷戰形勢和國共兩黨對

16 〈殷海光先生對我的影響（代序二）〉，《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頁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峙於臺灣海峽兩岸的緊張局勢。從學術背景和政治態度來看，史料學派的學者，特別是那些渡海來臺的人，對國民黨政府抱有相當程度的同情心，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一種天然的反感。這是他們追隨國民黨來臺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我們把那些在林毓生眼裡以追求所謂實證、純粹學問爲己任的學者都一概視爲國民黨的同路人，也顯然是不對的。事實上，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他們與國民黨政府由於政治理念的差異而造成的歷史觀的不同。這一不同在1949年以前就很表現出來了，比如胡適、傅斯年等人就常以批評者的身份評論國民黨的一些政策，寧願置身於國民黨及其政府之外。即使在日本侵佔東北（1931）以後，他們仍然力圖保持「獨立」的立場，創辦《獨立評論》。在政治傾向上，他們所追求的是一種西方模式的自由主義。

國民黨撤退到臺灣以後，這一自由主義的思潮，暫時受到了許多批評，而有被具有強烈民族主義傾向的「新儒學」取而代之的架式。比如胡適就爲徐復觀等人所強烈批評，幾乎視他爲國民黨葬送大陸的思想界禍首。「新儒家」所針對的正是五四以來中國學術界「親」西方的傾向；當然他們的矛頭主要指的是馬克思主義，但對同樣來自西方的實證主義和實驗主義，也無好感。在1960年代以後，錢穆在臺灣學術界和史學界的影響也日漸顯著，其突出標誌就是錢穆的《國史大綱》，從那時以來常被各校歷史系用作大一的通史教材。對那些初入史學之門的莘莘學子來說，錢穆的文字顯得有些古板，對書中所闡述的微言大意和時世背景也不甚了了，但作爲他們進校以後所接觸的第一本專業歷史書籍，其思想影響可以說是潛移默化、細長久遠。

在政治層面上，國民黨企圖吸取以往的教訓，對思想界採取更嚴厲的控制，如那時《自由中國》雜誌的封刊和主編雷震的被捕，就是一個顯例。同樣的手段，以後也用來對付其他持不同政見者，因而造成「臺大哲學系教授事件」、「美麗島事件」等。而這些事件的先例，就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可是，1950和1960年代的「白色恐怖」所造成的對自由主義思潮的壓制，並沒有使它在學術界失去其影響力。事實上，這種壓制反而使得它在年輕的學子眼裡更具吸引力，將其奉爲學術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正統」路子。這一「正統」，就是要以追求純粹學問爲目的，不曲學阿世，不急功近利，完全以科學的標準出發來面對事實，保持客觀的態度和嚴謹的治學風格。因此，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往往與學術上的科學主義、實證主義聯繫在一起。

我們可以舉一例來看一下兩者之間的關係。在1950和1960年代，奧裔美籍經濟學家海耶克（F. A. Hayek）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曾在臺灣學術界大爲流行。事實上，海耶克的經濟思想在那時的西方也十分風行。其原因與冷戰的氣氛大有關係，因爲海耶克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批評了社會主義，認爲它是死路一條，正好適應了當時自由世界反共的需要。但是，海耶克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也觸及了學術界。那些研究、詮釋海耶克思想的人，在用來批判共產制度的同時，也用來倡導思想和學術自由。[17]如海耶克自由主義在臺灣的主要詮釋者殷海光，就在《自由中國》第一期上，發表了〈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一文，對蘇俄共產制度對人們思想的鉗制，做了有力的批判。但在同時，殷海光提出要想真正有效地反對共產制度，非允許思想自由不可。然後他說：

> 但是，要實現思想自由，必須首先能夠自由思想，這也就是說，要實現思想自由，我們自身首先不可沒有自由思想的能力。這種自由思想的能力，是獨立不倚的，不受任何權威或暴力之影響的。這種自由思想能力之養成，固需外界不給任何限制，在思想者自身除了具備至大至剛之氣和必須的思想技術以外，還須有重經驗的（Empirical），分析的（Analytical），懷疑的（Sceptical），試行的（Tentative），和少談籠統主義多談問題的重事件的（Piecemeal），（雖然這是許多有求「全體」的習慣的人所不喜的）的態度。具有這樣的氣魄，技能和態度的人，才可能養成自由思想的能力。[18]

17 傅大為在〈殷海光的「海耶克」〉中指出，當時的臺灣學者如殷海光對海耶克思想的解讀，並不十分正確，而反映了他們自己的政治與人文關懷。見氏著《基進筆記》（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頁177~179。

18 殷海光〈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自由中國》，1：1（1949.11），頁14~16，引文在頁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段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自由主義與實證主義之間的內在聯繫。難怪提倡科學方法最力的胡適會對《自由中國》刊載海耶克的思想，表示讚賞。[19]不過，雖然這些人以自由主義反對共產主義，但在實行思想控制的國民黨政府眼裡，他們對自由思想的倡導，還是有害於對臺灣的統治。於是就有《自由中國》的封刊。

但反過來，正是由於殷海光等人的自由主義政治立場所隱含的批判政府的態度，有助於學術界人士繼續實證主義的治學風格，加固史料學派在史學界的地位，使得實證主義的治學風格爲學術界人士所欣賞，在史學界更加固史料學派的地位。當時領學界風騷的殷海光就在詮釋海耶克思想的同時，對胡適的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作了新的論證，提出「小心求證」在社會思想上的「意義尤爲重大」，因爲「如果我們抱著『小心求證』的態度，『不信一切沒有證據的話』，那麼對於五花八門的宣傳詞令會保持一種有彈性的抗力」。[20]易言之，雖然殷海光用新的科學理論將胡適的實驗主義作了新的闡述，但他的基本結論依然如胡適之故，即多談「主義」還不如解決「問題」。

其實，筆者在此無意過分強調殷海光對臺灣史學界的影響。事實上，如果我們承認臺灣史學界在那時受到「史料學派」的影響，那麼殷海光等非史學「科班出身」的人物不可能受到史家過度的尊敬。筆者只是想以此爲例，指出當時臺灣思想界的一斑，在1950和1960年代的臺灣，民國以來一些留洋人士所提倡的西方自由主義、科學主義的傳統，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殷海光對科學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也與胡適的說法十分類似，即兩者之間互爲條件。殷海光對科學的界定，基於一種實證主義的態度。他認爲科學歸根結底就是「一些基本態度或看法」，其性質是「印證的」、「懷疑的」、「累聚的」、「試行的」、「系統的」、「互爲主觀的」和「運作的」。除了他將「客觀的」改爲「互爲

19 胡適〈從「到奴役之路」說起〉，《海耶克和他的思想》（臺北：文星叢刊，1965），頁149~156。殷海光翻譯海耶克的文章主要載於《自由中國》第9卷（1953）數期。

20 殷海光〈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見氏著《思想與方法》（臺北：文星書店，1964），頁131~161，引文見頁160~1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觀的」以外，其它方面都與胡適等人在民國初年對「科學」的界定沒有區別。而且，正因爲科學有以上這些特徵，因此便與「民主」緊密相連；科學可以促進民主的建立，因爲後者可以建立在「累聚」、「試行」的基礎上逐步臻於完善。[21]這些想法又與胡適在《獨立評論》上有關「民主與獨裁」爭論的論點相似。

總之，雖然胡適等人的自由主義思想和實證主義的治學方法在1940年代到1950年代有一段曲折的經歷，但從那時臺灣學術界的思想氣氛來看，其影響力非但沒有減弱，而且有控制全盤的趨勢。[22]在這一思想氣氛的籠罩下，史學界仍然尊重考證的學問，也就不足爲奇了。

二、史學研究的方法論轉向

饒有趣味的是，雖然殷海光等人對治學方法的討論，與二十年前的胡適、傅斯年等人沒有太大區別，但他們對方法論的重視，已經表明其內部開始起了變化，將會有進一步的發展。換言之，如果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真的萬能，那麼也就毋須討論，只要拿來運用便可以了。如同胡適當年推崇「實驗主義」，是爲了提出一種新的研究途徑，殷海光對科學主義的重申，也正好表明當時的人已經開始重新思索方法論的問題了。但是，正如他的弟子林毓生所言，殷海光雖然已經覺察到史學應與社會科學接觸，但「他對社會科學的理解僅止於帶有科學主義色彩的行爲科學，反而於史學困難最有幫助的社會科學，如韋伯的貢獻，並不清楚」。[23]

---

21 殷海光〈論「科學與民主」〉，見同上，頁1~20。

22 傅大為在〈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從近代西方啟蒙到臺灣的殷海光〉一文中，對1950和1960年代臺灣學術界的實證主義氛圍有所分析，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4（1988），頁11~56。又見林毓生〈「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閱後〉和陳光興〈斷裂歷史的辯證〉的商榷文章以及傅大為的〈平行、斷裂、與幽靈：後記與答辯〉，載《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1(1989)，頁193~198；199~205和2：3：4(1989)，頁175~188。

23 林毓生〈殷海光先生對我的影響（代序二）〉，《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頁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殷海光的不足，爲他的學生輩所彌補。臺灣的史學研究在1960年代中期左右之所以會產生一個方法論上的轉折，正是借鑒社會科學進行歷史研究的結果。促成這一方法論轉向的一個重要機關就是創辦於1963年的《思與言》雜誌。當然，1971年復刊的《食貨》雜誌和1979年創刊的《史學評論》在推動史學方法論的建設方面也有重要的貢獻，但《思與言》以其跨學科的姿態，更能反映史學與其它學科結合的趨向，況且它創刊又早，因而在當時代表了史學界，甚至整個學術界的嶄新氣象。

從《思與言》的創刊，我們也可以看出西方史學與臺灣史學研究之間開始的緊密聯繫。當然，這一聯繫始終存在。由於冷戰的局勢，許多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生、學者無法去大陸接受語言訓練和從事研究，加上國民黨政府又以「正統中國文化」的代表者自居，以復興中華文化爲己任，臺灣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爲培養美國「中國通」的基地。這一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美國幫助在1955年創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當然，創辦該所的最初動機，可以追溯到朱家驊任中研院總幹事的時候，當時（1936年）朱就與傅斯年商量成立近史所；而1955年近史所的成立，正是朱任中研院院長的時候。[24]但美國學者費正清、韋慕廷等人在幫助郭廷以獲得美國基金會的支援，對近史所的創辦，有直接的推動作用。[25]

由於美國將臺灣視爲瞭解中共的一個基地，因此便有美國學者不斷來臺訪問。[26]不少在當今美國史學界的名牌學者，在當時都以學生或者助教授的身份來臺研究。他們的來訪，促進了雙方之間的交流：如臺灣美國史研究的權威學者孫同勛，就在現今美國中美關係史的權威之一、時任密歇根州立大學歷史助教授Warren Cohen當年訪問臺大時，幫助後者蒐集和整理過資料。而Cohen以後又幫助孫到美國留學，使其受

24 見陳之邁著《朱家驊先生年譜》（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頁92。

25 具體詳情可見張朋園的新著《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廷：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7）。

26 張朋園的《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廷》書中，對此有較詳盡的分析，見頁5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美國史的訓練。[27]

不過，在幫助臺灣史學家瞭解西方史學新潮這方面出力最多、影響最直接的是那些由臺灣赴美留學，以後又長期或短期回臺教學的人物。在這其中，以許倬雲、陶晉生爲主要。而許又比陶早回臺灣，擔任臺大歷史系主任多年，因此作用更大一些。但陶在回國以後，與其父陶希聖復刊《食貨》雜誌，推動史學的科學化和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其影響力也十分重要。

在許倬雲1962年從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臺以後，他與差不多同期回臺、與他背景相似的胡佛、李亦園、楊國樞等人共同創辦《思與言》雜誌，開始有系統地促進臺灣史學的方法論轉向。許倬雲與胡、李、楊所受訓練雖有不同（胡佛是政治學家，李亦園爲人類學家，而楊國樞爲心理學家），但卻能相互砥勵，相互借鑒，更有效地將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他們對史料學派專注考據的學風，開始表示不滿。在《思與言》雜誌創辦的第二年（1964），該刊發表一篇〈社論〉，題爲〈史學可走之路〉，其中說道：

> 逮及近世，民國以來的史學發展為二大類型。一類以狹窄的民族偏見為歸宿，正如歐洲在民族國家初起時一樣，治本國史者以證明本位文化之優越為目的。……另一大派則以史料學為史學，不談史學目的，只是點點滴滴的考訂一小段史實，一小件史料，或一小類制度。這一派以蘭克的史學為標榜，其實只抓住了蘭克史學的前一半，忽略了蘭克以解釋史事為目的的後一半。這一派一味求真，以致把對象的重要性程度撇開不提。[28]

他們認爲，爲瞭解歷史本身的複雜、多樣，「單靠傳統的史學方法是不夠的」。爲此，他們提出要借助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手段。他們承認，史學需要考證，但是，「我們不可能有那麼多的時間來全盤重建過去。我們不能不以速寫的畫像，擷取神韻，來代替不可能由

27 孫同勛與筆者的談話，1999年4月3日於孫寓所。

28 〈史學可走之路〉，《思與言》，2：4（1964.11），頁1，總頁3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枯骨重生的血肉之軀」。總之，史學不僅要「敘述」，而且要「解釋」。[29]

這段話，可以視爲許倬雲他們這一代人革新史學的宣言。自此而降，臺灣史學的面貌開始發生了轉變。在1965年，《思與言》雜誌又再次向史料學派的學風開展了批評。在題爲〈史學的相對觀點〉的社論中，他們提出科學史學的性質值得進一步探討：因爲歷史必須不斷重寫，以反映時代的興趣。由此，他們說道：

> 由這一觀點來推廣，我們看出了單純為史料而尋史料的窘局。哪一種史料最受史學家的注意，也是不能離開史學家代表的注意重點。的確，歷史是史事與史家無盡無休的對白。必須承認這一個不可避免的限制，史學家方可接受其應擔任的角色，而不勉強冒充史學家不能做到的假科學英雄。[30]

如果上述言論只是從史學相對性的觀點對史料學派的一點旁敲側擊，那麼在四個月以後，《思與言》的另一篇〈有感於當代史學〉的社論，則將矛頭直接針對住了史料學派，稱之爲「新歷史考據學」。該社論在分析這一「新歷史考據學」的興起時，點了蔡元培、傅斯年的名，並引用了他們的原話，如傅的著名的「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等。然後，《思與言》批評道：

> 這種只重史料考證而不著史的治史態度，在中國近代史學界發生了極深遠的影響，迄至今日，考史而不著史，是中國史學的主流。一些頗為淵博的史家，殫畢生精力於訂偽正謬，襞績補苴之間，而不肯寫屬於綜合性的歷史大著。他們所考證出來的結果，固然不無糾謬發覆之見，符合歷史求真的宏旨，可是一般說起來，太失之於繁瑣了，一個年代的考證，一處地名的考證，一本書作者真偽的考證，以及一般整齊類比，考訂異同的工作，都是瑣瑣碎碎，枝枝節節，考之者不憚其煩，覽之者難以卒讀。加以不宗尚簡之義，鋪張敷陳，

29 同上，頁2，總頁343。

30 〈史學的相對觀點〉，《思與言》，3：1（1965.5），頁1~2，總頁491~4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喋喋不休，一小的考證，有至數萬言或數十萬言者，洋洋灑灑，可稱巨製，而稽之則其義不多，有傷堆砌。這無怪乎一般讀者對之仰之彌高而避之惟恐不速了！[31]

以這樣的批評語氣來總結以往臺灣史學界的狀況，表明了《思與言》的編輯與作者對社會科學史學的嚮往之意。因此我們有理由將1960年代中期視爲臺灣史學一個新階段的開始。[32]

在這之後，《思與言》雜誌成爲介紹、研究西方史學思潮，並以此來推進臺灣史學研究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主要陣地。那時常在該雜誌上發表論文的既有當時年富力強的中年學者，如杜維運、張存武、李恩涵、王爾敏，又有初出茅廬的年輕學子李弘祺、黃俊傑等人；當然，從美國長期或短期回臺的陶晉生、陳啓雲等也爲該刊的成長提供了不少幫助。如陳啓雲在1967年發表的一篇談話式的文章〈談歷史研究〉，就對當時美國史學界的最新動態有不少介紹：他以美國「漢學」傳統之變化爲例，來分析史學與社會科學如何走向結合的問題。[33]當時還是學生的李弘祺、黃俊傑則以專論或翻譯來介紹引進西方史學研究的新趨勢、新理論和新方法。[34]這表明那一代的學生中，至少有一些人已經在嘗試用新的手段研究歷史，不再像林毓生的時代那樣既不滿又無奈了。

另外，在1970年代初期，《思與言》雜誌還召開了三個有意義的討論會，一個題爲「二十年來我國的史學發展」，另一個題爲「歷史研究

---

31 〈有感於當代史學〉，《思與言》，3：3（1965.9），頁2，總頁588。

32 黃俊傑在為賴澤涵主編的《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一書所寫的〈三十年來史學方法論的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一文中（頁161~240），從臺灣史家重視史學方法論的角度，將1970年視為一個新的階段。但他的考慮方式，主要以有關論文的發表數量為基準，而我更注意的是史學觀念的變化，因此有所不同。我的分期與李東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和杜正勝在〈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的觀點類似。李文載《中國論壇》，21：11（1985.10），頁36~42。杜文載《歷史月刊》，92（1995.9），頁79~85。

33 陳啟雲〈談歷史研究〉，《思與言》，5：2（1967.7），頁11~14，總頁1201~1204。

34 李弘祺〈試論思想史的歷史研究〉；黃俊傑〈科學方法與史學家的工作〉，分別見《思與言》，7：2（1969.7），頁30~43，總頁104~117；9：6（1972.3），頁41~46，總頁359~3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歷史教學」，最後一個題爲「社會科學與歷史學」，分別由張存武、陶晉生單獨或共同主持。這三個討論會，觸及了史學史研究的主要方面，既有對以往史學規範的檢討，又有對培養史學人才的思考，更有對史學未來發展的探索。在第一個討論會上，主講的杜維運、李恩涵都認爲，在以往的二十年中，考據是史學研究的主流。杜維運說道：

> 近二十年來，不可否認的考據仍然是史學的主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可以說完全籠罩在考據風氣之下的，臺灣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與考據有極深的淵源，學術著作的審查以及資助，也以其是否有考據份量作最重要的標準之一。[35]

對此傾向，杜和李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滿。杜維運認爲，過分重視考據，妨礙了史學家進行貫通的工作，使得有人「畢生研究春秋史，最後寫不出一部春秋史出來；畢生研究隋唐史，最後寫不出一部隋唐史出來」。而李恩涵則乾脆提出，「『歷史爲史料學』的時代已經過去。當代史學工作者不應仍以單純的從事史實的重建爲滿足，而應在此之外，從事史實解釋的工作」。[36]

很顯然，李恩涵、杜維運能有這樣的認識，與他們都曾在西方受過教育不無關係。在當時史學走向自然科學的風氣影響下，他們都傾向認爲歷史著述不應再以敘述故事爲滿足，而必須對歷史的活動有所解釋。實際上，提出歷史必須解釋，也就是表達了對人類解釋能力的一種自信。而這一自信，正是從西方社會科學的發展中獲得的。隨著人類學、經濟學、心理學和社會學在二次大戰以後的蓬勃進展，對人類社會的研究有了不少突破；這種突破對史學研究帶來了衝擊。這一衝擊，主要表現在史學家眼光的擴大和轉向—從個人擴大到集體、從上層轉移到下層—具體表現爲社會史的興起。

當然，社會史的興起，在西方史學界有其社會和政治原因。如1960年代的左傾激進主義運動，便以反精英文化爲其表現方式之一，因而促

---

35 見〈「二十年來我國的史學發展」討論會〉，原載《思與言》，10：4（1972.11），引自李弘祺等著《史學與史學方法論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0），頁376。

36 同上，頁377；頁3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使歷史學家重視社會大眾的力量和作用。[37]但是就史學史的發展來看，要想對社會大眾作研究，除了有此意向以外，還需有手段。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西方就有人寫《英國人民史》、《法國人民史》等著作，但其內容卻與1960年代以後的社會史，差之甚遠。原因是，當時的史學家沒有從事社會團體研究的手段，還是採用了傳統的敘述方式，運用常識作分析。而這些研究大眾社會的手段，正是由於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新發展所提供的。有了這些手段（其中包括量化的分析和理論模式的建立），解釋集體的心理、行爲才變得可能；史學家才能引用這些手段來從事「真正的」社會史研究。

在《思與言》召開的「社會科學與歷史學」討論會上，主持人陶晉生就在引言中引述別人的話說，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共同點就是它們的研究對象都是人，而既然要研究人，就必須「對有關人的理論有基本的認識。有人說史家所據以判斷的只是常識而已。但是現代社會科學家的發現，使常識的層次提高，史家要轉向他們來充實自己的常識，不應墨守過去的陳腔濫調」。[38]而張朋園在該會的一個發言，更是一言道破了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密切關係——他認爲史學借助社會科學是「必然的趨勢」，其原因在於：「歷史的研究，過去我們注意一個皇帝、一個大人物，而今天要注意的是人群大眾，如果研究一般大眾而不借重社會科學家的理論與方法，則無法看出問題來」。[39]在那次會上，文崇一、胡佛、李亦園、易君博、楊國樞從各自的研究領域，介紹了與史學相關的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雖然他們的介紹，由於隔行的原因，有隔靴搔癢之感；但召開這樣的會議，請外行的人來指導史學研究的工作，正好說明

37 有關二十世紀史學的發展變化，參見Geor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另外，Joyce Appleby, Lynn Hunt,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也對美國社會史的興起作了一些分析。

38 〈「社會科學與歷史學」討論會記錄〉，原載《思與言》，12：4（1974.11），見李弘祺等著《史學與史學方法論集》，頁31。

39 同上，頁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學家本身感受到的方法論危機。

張玉法對此危機感有十分準確的描述。他說：

> 各類科學都在無限擴張其範圍，尤其是社會科學的擴張，對史學的威脅極大，史學家如不振作，史學將有被瓜分的可能。有價值的史學著作將為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甚至統計學家，心理學家所寫的歷史，史學家將只是「東抄西湊」的人，而史學也就變成了雜燴。[40]

由此憂慮，張玉法在那個年代，對史學方法論的更新作了不少思索，其文字大都見於他與臺灣師範大學的同仁在1971年所辦的《新知》雜誌。這一雜誌與《思與言》一樣，具有跨學科的性質，但又以普及爲目的，在學界也有一定的影響。[41]

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理解這一危機意識，就是一種對傳統史學方法的懷疑態度。史學家開始感到考證方法的不足，希望對歷史的演變提出一種解釋；在這樣的背景下，陶希聖把《食貨》雜誌復刊，明確地以倡導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爲宗旨，使得該雜誌很快成爲史學界論文發表的主要園地。於是，社會史的研究逐漸爲人所重視，成爲臺灣史學界的一個新潮。

陶希聖在復刊詞中，用十分淺顯的文字表明了他的宗旨。對他來說，「社會科學家就其所研究的部門作歷史的探討，是常有的或必有的工作。歷史學家或有意或無意，借助於社會科學以期其解釋歷史上的事件和問題，也是常有或必有的事」。[42]陶希聖之所以這樣說，顯然與他原來的經歷有關。作爲「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在1930年代就企圖利用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解釋中國歷史的演變。

但是1971年復刊的《食貨》，其關懷的問題與舊的《食貨》不同。

---

40 張玉法〈史學革命論〉，見氏著《歷史學的新領域》（臺北：聯經，1978），頁155。

41 張玉法在《新知》上的譯作和文章，均收入《歷史學的新領域》一書。《新知》雜誌自1971年開始發行，到1974年結束，共有四卷。那時該刊的作者還有李國祁、張朋園等。

42 〈食貨復刊詞〉，《食貨》復刊，1：1（1971.4），頁1，總頁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雖然舊的《食貨》也不想用史料來論證諸如中國社會發展的經濟規律等觀點，但作者寫作時還是帶有這樣的問題意識。正如那時的陶希聖所說的：「心裡一點什麼也沒有，我們去就史料論史料，好嗎？這也是不成的」。[43]因此杜正勝總結說：「陶希聖仍然不能忘懷於大理論」。杜還引用陶晚年的話說：「《食貨》半月刊反公式主義，反教條主義，主張自由運用史學方法，不能算是考據，也不算歷史哲學，也不完全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從這裡就產生了社會史觀」。[44]其實，陶所用的「社會史觀」一詞，就表明他那時對理論的興趣。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復刊後的《食貨》就完全沒有問題意識，只能說那時《食貨》作者所關心的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問題，已經與陶所關心的十分不同了。在某種程度上，陶也無法真正理解那些新的理論和方法，只有在美國經過社會科學「洗禮」的陶晉生、許倬雲等人及其弟子才能有深入的體會。正如杜正勝所言：「我們看到的《食貨》月刊遂多反映五、六十年代美國社會科學的面孔，和原來的半月刊其實有很大的距離」。[45]從陶希聖那時給《食貨》的作品來看，也能說明這一點。陶那時的幾篇大作〈齊學入晉，晉學入秦〉和〈秦用晉法，漢行周道〉，特別是〈儒法關係之社會史的考察〉和專著《中國法制的社會史考察》，既有理論方面的探索，更有個案的具體研究，對倡導社會史的研究，有榜樣的作用。[46]陶家兩代對社會史研究的貢獻，有目共睹。

那麼，1970年代臺灣的社會史研究，其主要關懷和特點是怎樣的呢？我們可以看一下許倬雲的一些論述。雖然許在1970年已經去了美國教書，但他在這以前，任教臺大八年，培養了好幾代（指學校畢業的屆

43 陶希聖〈編輯的話〉，《食貨》，1：1（1934.12），頁29~30，總頁29~30。

44 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特從理論、方法與資料、課題論〉，《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系，1991），抽印本，頁32。

45 杜正勝〈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同上，頁47。

46 見《食貨》復刊，2：12（1972.3）和3：2，4，6，8（1973.5，7，9，11）和《中山學術文化集刊》第十七集（1976），第十八集（1976）和第十九集（1977）。專著由（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另見陶晉生〈陶希聖論中國社會史〉，《古今論衡》，2（19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數）學生，因此他對社會史的認識，既有其代表性，又有很大的影響力。對許倬雲來說，他之所以對社會科學有興趣，並不想由此來發現歷史演進的普遍規律。因此，他與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人物有很明顯的差異。比如他說：

> 早期社會學，曾經認定了要追尋單一的因果原則，至今還有若干史學界為此對於社會學不無猜疑，也有人凡用到「社會學的方法」一詞時，總誤以為相當於社會經濟決定論。事實上，社會學家早已放棄了追尋放諸天下彌不合的金科玉律。大多數的社會學家，只應用一些中距離的理論，找相當的社會，來研究其中諸變相的適度因果關係而已。[47]

這一段話，可以說是許的「夫子自道」；他所想用的理論，也就是他所謂的「中距離的理論」。他在文中舉的一些西方學者將社會學與史學研究結合的例子，也說明了他的興趣。這一興趣，就是採用一些社會科學家的理論，先將社會分類，然後在其中挑選一個「變數」，利用量化的材料，分析社會各階層之間在某個時間點上的變動，用個案來說明社會的結構及其活動。這種「功能主義」的作法，如果從史學與社會學的結合來看，更多見到的是社會學的影響，而少見許所期許的，史學予以社會學的「時間深度」。[48]或者說，這一「時間深度」往往爲時甚短，充其量只是一種「短距離」。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1970年代的社會史與1930年代的社會史之間的顯著不同。事實上，自那時以來，這種專注於某個課題、某個歷史時期的史學，代表了史學研究的世界性潮流。[49]

在當時的臺灣史學界，由於意識型態的原因，對那種希求在歷史

頁32~43。

47 許倬雲〈社會學與史學〉，《二十世紀之科學，第九輯，史學》，李宗侗主編（臺北：正中書局，無出版日期），頁9。

48 許倬雲〈社會學與史學〉，同上，頁21；頁16。

49 西方從1970年代以來，有所謂的「微觀史」、「日常史」等學派的產生，也就體現了這一潮流。而在中國史的研究領域，除了許倬雲、何炳棣的著作以外，最著名的也許就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尋找規律的馬克思主義學風，自然有天生的反感，因此對社會科學所帶來的新的治學方法，很容易接受。這一種心態，自然與臺灣與大陸的敵對關係有一定的聯繫。事實上，臺灣史家在方法論上的探索，無論是堅持「史料學派」或者革新「史料學派」，都有意無意地與這種「對抗大陸」的心態有關。晚年的沈剛伯寫了一篇方法論方面的短論〈從百餘年來史學風氣的轉變談到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的教學方針〉，對十九世紀流行的歷史哲學，做了總結和批判，認爲這種「史演論」，即希望總結歷史演變通則的作法，漏洞百出，不再符合時代的需要。黃俊傑在1987年回顧史學方法論研究的評論中，特意引用了沈的文章，表現出新老兩代史學家的一種思想上的共識。[50]

雖然有此共識，但如何有效地運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促進史學研究並取得顯著的突破，卻在那時的臺灣並不見。黃俊傑、杜正勝、黃進興等人在回顧1960到1970年代臺灣史界的方法論熱潮時，都有比較類似的看法。如黃進興就提出：如果只希望社會科學對史學研究作一種方法論上的指導，其貢獻「是相當受限制的」；方法及方法論，不是「實際歷史研究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51]黃俊傑則希望史學界同仁在注重吸收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時，也注意中國的學術傳統，「寓開來於繼往，能守舊方能創新」。[52]而杜正勝在反省那時社會史研究的不足時，逐步孕育出「新社會史」研究的動機，並在《新史學》雜誌上，加以具體闡述和大力推廣。[53]

他們這些人的文章，表現出1980年代以後臺灣史家對以前社會史研究、社會科學方法討論的一種反省。這種反省和批評、甚至不滿，也並

50 沈剛伯文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1（1974.5），頁1~8。黃俊傑文見前引賴澤涵主編《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頁203~206。

51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康樂、黃進興主編（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頁37；頁39。

52 黃俊傑文見前引賴澤涵主編《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頁221。

53 杜正勝的〈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對許倬雲等人的社會史研究，有不少批評，並提出了新的構想，見前引抽印本頁49以降。他的「新社會史」觀點見氏著〈什麼是新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非無中生有，而是有一定的事實根據的。從《食貨》復刊以後所刊載的文章看，真正能運用新的方法研究歷史的，並不太多，比較多的是翻譯與介紹：如張玉法就在推廣、提倡心理史學及量化史學方面，用力甚勤，但似乎介紹大於運用，興趣大於實踐。他今天在學術上的地位，也並非以此爲基礎。[54]當然，張玉法的例子並不特別，當時在方法論的討論中比較活躍的鮑家麟、黃俊傑、康樂、黃進興，以後都慢慢將學術興趣轉到了其它方面，真正能對史學方法一直保持濃厚興趣的，似乎只有杜維運。[55]

在那個年代對新方法既有介紹又付諸實踐的，以古偉瀛爲代表。他對量化史學的倡導和研究，開始於在臺大研究所的階段，但以後一直不斷耕耘，達二十多年，即使在加拿大留學期間，也不放棄，而且還利用機會，修了有關方面的課程。[56]但儘管有一些成就，他還是感到困難較大，量化史學作爲一個新學門，缺乏獨立性，「量化較大的助益是在從事研究的『過程中』，而非在其結果」。不過反過來，量化史學雖然遭到了一些挫折（這在西方亦是如此），但量化作爲一種方法，卻已經深入人心，成爲社會史、經濟史研究工作者的看家本領之一：[57]如劉翠溶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就是一個很傑出的例子。最近中研院史語所的重點計劃之一，是將中國歷史典籍輸入電腦，製成索引，讓讀者在網路上查

會史？〉，《新史學》，3：4（1992.12），頁95~116。

54 張玉法的有關文章均收入氏著《歷史學的新領域》一書。他的力著《中華民國史》等並沒有標榜方法論上的創新。

55 黃進興在與筆者的談話中（1999年6月18日），對他自己未能繼續跟隨杜維運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表示出某種遺憾。他在〈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六期〔1997〕，頁263~284）文章的首頁注中，也表達了這樣的心情。

56 古偉瀛與筆者的談話（1999年6月15日）。古偉瀛有關量化史學的文章多見於《食貨》，既有翻譯，又有研究心得。見〈內容分析之幾種用於研究傳記歷史的方法及其於中國材料的初步運用〉；〈愛德華·休特的史學與電腦〉；〈中國社會的正式組織與昇遷〉（譯作）；〈C分析簡介〉；〈史學量化及其應用於中國史料的一些考察〉，《食貨》復刊，1：12；4：4；5：1；5：4；10：1，2。

57 參見古偉瀛〈歷史量化的反思〉，《新史學》，2：2（1991.6），頁109~1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詢。這也便是量化史學的一個新發展。

由此爲例，我們可以將1960年代中期以來的史學走向社會科學的運動，從兩個方面來認識其影響。雖然運用新方法寫作的歷史著作，並不多見，成果也良莠不齊，但通過這些有關革新史學方法論的討論，史學家對新方法的敏感度和對西方學術界的興趣，則在1970和1980年代有一浪高過一浪的趨勢。促成這一興趣的，主要還是在美的華裔教授的回臺講學：比如許倬雲、林毓生、陶晉生等人雖然在美國任教，但時常回臺講學，不斷將新的理論與方法帶入臺灣學術界：對他們的每次訪問演講，學生們總是趨之若鶩，場場爆滿；而雖然不是臺灣出身的余英時，其訪問和在臺灣發表的論著也受到了臺灣師生的熱烈歡迎，在某個時期甚至超過其他學者。[58]另外，那些在西方受教育後回臺或來臺任教的年輕學者，也十分注意將自己的所學引入臺灣學術界。比如對法國年鑑學派的介紹、研究，就由海外的汪榮祖、夏伯嘉、李弘祺開其端，以後梁其姿、賴建誠等留法的和留美的周樑楷又作了進一步的研究，分別刊載於《思與言》、《史學評論》等刊物上。梁和賴以後還出版了譯作和專著。[59]

但在另一方面，臺灣史學界雖然受到社會科學的激蕩，但史學作爲一門古老的學科，自有其內在的活力和固有的治學態度，不太容易像張玉法所擔憂的那樣，爲社會科學所分割而成爲一種「雜燴」。換言之，史學有其本身的自主性，不可能爲社會科學的潮流所徹底吞沒。1979年《史學評論》的創刊，余英時寫了一個十分有意義的〈代發刊詞〉。

58 根據古偉瀛、黃進興的回憶和與筆者的談話（1999年6月15日和18日）。

59 汪榮祖的〈白德爾與當代法國史學〉首先提到了年鑑學派，見《食貨》復刊，6：6（1976.9），頁1~8，總頁233~240。夏伯嘉的〈馬克布洛克與法國年鑑學派〉可能是臺灣介紹年鑑學派的第一篇，載《史學評論》，1（1979.7），頁211~228。不過在同期，李弘祺的〈歷史主義的危機與超越〉也談到了「年鑑學派」，見頁41~70。另見李的〈從社會科學到社會整體歷史〉，《史學評論》，3（1981.3），頁39~78。周樑楷的〈年鑑學派的史學傳統及其轉變〉和梁其姿的〈心態歷史〉載《史學評論》，7(1984.4)，頁57~74；75~98。另見梁其姿編譯《年鑑史學論文集》（臺北：遠流出版社，1989）和賴建誠譯著《年鑑學派管窺》（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從近代中國以來的史學發展爲經，以臺灣史學界當時對西方社會科學的興趣爲緯，具體分析了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他提出原來的史料學派已經不敷現實的需要，因爲史料學派將歷史事實作孤立的處理，證而不疏。「在『史學即史料學』的理論支配下，他們的『證』的範圍則退縮到材料的真僞這一點上。在這種情形下，真正的史學研究是無從開始的」。但在另一方面，他提出史觀學派，也即馬克思主義用理論指導歷史研究的作法，也失之偏頗，使得史學成爲政治鬥爭的工具。余認爲，「任何一門科學都有它的基礎研究、理論研究，這是科學紀律的基本要求。…沒有基礎研究，史學便根本不能成爲一種獨立的學術」。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就是無視了在史學研究中的基本紀律，將源自西方的所謂歷史規律強加於中國的歷史。

因此，余英時提出了「史無定法」這一論點。不管有多少好的理論或方法值得歷史學家去吸收、運用，但這些都只能起一種輔助的作用，而不能將之視爲史學本身的方法。史學家應有的態度是（余借用章學誠的說法）：「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那麼，什麼是史學本身的方法，即史學家的「獨特的一套工作程序」呢？照余的看法就是要「確定證據，建立史實，發現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解釋變化等等」。這些工作雖然需要其它學科的幫助，但卻是獨特地屬於歷史學的。換言之，史學有其自主性；社會科學的方法只能在「技術層面」上予以幫助，但卻不能取代史學方法本身。[60]

余英時的這番話，對當時正熱衷於借鑒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的臺灣史家來說，無異是「當頭棒喝」。而且這番話由余這麼一個在美國著名大學任教授的人說出，其作用更是不同凡響。在文章中，雖然余表現得不偏不倚，對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都各打五十大板，但他在最後強調「史無定法」，強調史學研究的自主性和基礎訓練，其後果顯然有利於史料學派，因爲正是史料學派才更重視史學家對史料的蒐集、證據的建立等余英時所謂的「工作程序」。雖然余也希望史學家要對歷史事件的關係

60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代發刊詞〉，《史學評論》，1（1979.7），頁1~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某種說明，但這一類的工作在余的工作程序上，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上的。他的「史無定法」，從本質上看，就是希望讀者不放棄傳統的研究方法，因爲其實歷史研究一直是有「定法」的，只不過在當時的風氣下，這一傳統的「定法」不再有吸引力了。而他提出「史無定法」，就是要人們不迷信新的研究方法，而不迷信、撇用新的方法，舊的就自然回來了。

其實余英時之所以能在當時對臺灣學術界有很大的影響，也是因爲他能在一切向西方靠攏的風潮中，奉勸讀者、聽眾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他個人對西方學術常常持有一種批評的態度，不是一味推崇。同時他對中國的學術傳統，也一直保持一種適度的尊敬。[61]他在當時發表的論著，雖然問題的提出往往與西方學術界的理論有某種聯繫，但讀者在他的論證、展開過程中，卻能感受到他深厚的中國文化、學術素養。這種兼通中、西的學問，在心理上和教育背景上都容易與當時臺灣的師生產生共鳴。因此，即使在史學走向社會科學的熱潮中，史學家基本的治學傳統還是沒有根本改變；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史料學派的流風餘韻。另外，臺灣學界對余英時學問的崇敬，也多多少少與上述「對抗大陸」的心態有關。大陸上的文革，使得中國文化斯文掃地，而臺灣對傳統文化的堅持，正是鮮明的對照。

但是，雖然在《史學評論》創刊的1979年，有了像余的那種對自1960年代中期以來的史學方法討論的反省（例如前述黃進興等人在1980年代的反省與中研院民族所在那時召開的「社會及行爲科學研究的中國化」的研討會），但整個方法論的討論，還是取得了一個顯著的成效：那就是史學領域的擴大。換言之，雖然人們對新方法的採用開始抱有一種謹慎的態度，但史學研究的面貌，卻還是與以往不同了。許倬雲1997年在回顧臺大歷史系博士班成立三十年的發言中說，自1967年以後，

> 在史學研究方面，社會經濟史逐漸由制度與文化史合流，發展為另

61 古偉瀛回憶道，在余英時的一次演講中，他提問一個史學初學者的入門書籍。余的回答是「讀四史」，讓當時著迷於西方新方法的古，感到吃驚。古與筆者的談話（1999年6月15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一重要領域，審視臺大歷史學（系）博士論文的題目，這一趨勢顯已可見端倪。主題的擴散，也漸由上層社會，及於社會的各層次，由中國一盤棋，逐漸注視地區性的特色，由「正史」資料，逐漸顧及民間檔冊，記錄、碑傳……[62]

因此，以社會經濟史爲主的歷史研究，已經成爲自1980年代以來臺灣史學界的主流。這一主流的形成，不能不歸功於史學方法論的討論。對這一主流傾向，我們可以從兩個例子來看出，而這兩個例子，都爲以後臺灣史的研究，培植了基礎。許倬雲在描述這一變化中，用「逐漸」這樣的形容詞來勾勒臺灣史學研究的變化，這是符合事實的。比如臺灣史的研究，就是自1965年以來逐漸開展起來的，以那年臺大文學院舉辦的「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的座談會爲例。在這以前，對臺灣的研究只是零星和分散的，如對鄭成功的紀念等。[63]1966年才首次出現了以臺灣史爲題的碩士論文，顯示臺灣史可以成爲一個研究的方向。而臺灣史或臺灣研究的開展，在當時正是史學領域擴大和與社會科學結合的一個結果。

第一個例子是由張光直推動的「臺灣省濁水、大肚兩溪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劃」（1972），簡稱「濁大計劃」。這一計劃不僅結合了李亦園、王崧興於1965年以來所從事的臺灣漢人社會的研究，而且以其跨學科的方式，對該區域漢人的移民、墾荒和土著的漢化過程做了探討。第二個例子是中研院近史所與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合作進行的「中國近代化之區域研究」的一系列計劃（1973），[64]其中閩浙臺作爲

---

62 許倬雲〈走向史學的新途徑〉，《史學：傳承與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紀念沈故剛伯先生百齡冥誕暨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成立卅週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98），頁7。

63 臺灣史研究者張炎憲也以1965年為分界線，將在這以前的臺灣史研究視為一種民間的研究。見氏著〈臺灣史研究的新精神〉，收入《建立臺灣的國民國家》，吳密察、張炎憲等著（臺北：前衛出版社，1993），頁105~108。

64 該計劃從1973年8月進行到1977年1月，主要研究時期是從1860年到1916年的中國各區域的歷史。然後又有「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劃，從1977年2月開始著手進行至1978年1月完成，主要研究的時期為1916年到1937年。然後自1978年2月起，又開展「中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個區域，由李國祁爲首攜師大的吳文星、溫振華等人從事研究。前者是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嘗試，而後者是在社會科學理論影響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典型表現。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臺灣史學史（以學院派的著作爲例）的連鎖關係：由方法論的革新引向史學研究領域的擴大，而從史學領域的擴大，又轉向地區史的研究。在地區史的研究中，又發展出臺灣史，使其在1980年代後期以後成爲臺灣史學研究的熱點。

三、臺灣史的興起

上述的分析，主要以臺灣史學界爲基點，也就是從所謂學院派的角度入手。這樣的作法，自然有其缺陷，比如在臺灣史的研究中，早期的作品大部分都非臺灣學院派人士所爲。甚至，有些有影響的作品，如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和王育德的《臺灣——苦悶的歷史》，都出版於海外。但在1980年代以後，則對臺灣史的研究，造成了較大的影響，特別就通史的寫作而言。不過，既然本文的寫作目的是考察歷史研究在臺灣的變遷，不是臺灣史研究的興衰，因此必須以學院派的作品爲主要的研究對象。

就史學界的情況來看，臺灣史研究的發展，大致上經歷了兩個階段，即從作爲地方史的臺灣史到具有民族史意向的臺灣史的轉變。實際上，「臺灣史」這個名稱在1970年代以前是幾乎不存在、也無法存在的。比如上述史明與王育德的著作，雖然出版於海外，還是沒有直接以「臺灣史」作爲標題（王著於1980年代在臺灣出版時，曾改名爲《苦悶的臺灣》）。可見「臺灣史」的真正興起，成爲學者研究和教學的對象，實在是1987年臺灣解嚴之後的事情。「臺灣史」這一名稱在目前的普及運用，也從一個側面表明臺灣「本土意識」的高度增長。

從1987年以前臺灣史的研究來看，臺灣的確是被視爲中國的一個地區。如「中國近代化之區域研究」中，就把臺灣與福建、浙江合爲一

現代化專題研究」的計劃，時期為1860年到1916年。見《史原》，8（1978），頁4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1965年臺大首次召開的「臺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也顯然是爲了說明臺灣史研究之所以值得開展，是因爲它對研究中國歷史的某些階段有一定補充的意義。當時在會上發表的許多論文，都以此爲論證目的。如首先在臺灣教授臺灣史的楊雲萍的論文是〈南明鄭氏時代的臺灣在中國史上的地位〉。許倬雲的〈臺灣墾殖與中華民族的擴展〉和衛憲林的〈臺灣土著社會研究與中國古史印證〉也都是例子。而陳紹馨的〈中國文化變遷研究的實驗室——臺灣〉，更明確地爲當時的臺灣研究定了位。[65]

這種定位的方式，與美國當時把臺灣視爲研究中國的基地有關。臺大在召開了上述首次臺灣研究研討會後，得到美國哈佛燕京社的補助，在1965年12月至1967年7月間，連續召開了討論會十一次、演講會二次、採訪會二次和戲劇表演會二次，都以臺灣研究爲主題。[66]由此說明，臺灣史和臺灣的研究已經正式進入學院的殿堂。這一研究的開展，如同張隆志所言，「實與戰後臺灣納入中美社會『核心與邊陲』關係體系後，受美國爲主的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有關」。[67]這句話，概括了兩個方面。第一是臺灣如何成爲美國學者研究、對付「紅色中國」的基地和「實驗室」；第二是臺灣研究的開展與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之間存在的關係。

從臺灣是中國研究的「實驗室」這樣的角度看，很自然地就會產生出像郭廷以、李國祁等的「內地化」的歷史觀點，也即強調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歷史與文化聯繫，把臺灣社會視爲漢人社會的延伸與擴展。如郭廷以在《臺灣史事概說》中開宗明義地說道：

>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繼續不斷分向四方開擴推進，經之營之，西北與西南，東北與東南，黃河兩岸，長江南北，珠江流域，以及濱海地

65 有關當時在會上發表的其它論文，見張炎憲〈臺灣史研究的新精神〉，《建立臺灣的國民國家》，頁109。

66 張炎憲〈臺灣史研究的新精神〉，同上，頁109。

67 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理解》（臺北：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91），頁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帶，均收入了他們的活動範圍，生長孳息之所。由於大海的限制，臺灣容或比較遲後一步，然亦不算太遲。而中華民族在這裡的成就之大，臺灣的中國化或漢化的徹底，文化進步的迅速，不僅有過於大陸中國的若干邊區，並亦無遜於中原腹地，誠所謂後來居上。[68]

郭廷以的著作初版於1954年，正是他得到美國基金會的贊助，成立中研院近史所的前一年。他在書中強調臺灣漢化的高度成就，強調臺灣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因而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臺灣能夠成爲歐美學者研究中國的一個基地。[69]循著這樣的思路，郭在1960年代後期又提出了「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計劃」。雖然他本人在1969年離開了臺灣，不克親自領導該計劃的執行，但他的思想卻始終是該計劃的指導方針。由此，李國祁將郭廷以的論點加以發揮、擴展，正式提出臺灣漢人社會轉型的「內地化」論點，也是順理成章的。

所謂「內地化」的論點，也即強調清代統治者對臺灣的漢化措施。這一漢化措施，自然是主要通過政治手段達到的，但清代以來漢人到臺灣的大量移民，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因此，從李國祁所發表的論文來看，他同時注重政治與社會兩個方面的因素，即所謂「政治近代化」與「社會近代化」。前者比較容易理解，指的是劉銘傳等清朝官員如何用中國大陸的統治方式治理臺灣。而後者指的是臺灣漢人在移民臺灣以後，如何逐步擺脫「移墾社會」的特點，如家庭人口較多、男女比例懸殊、地緣觀念強烈等，逐步向內地社會看齊的過程。[70]

如同上述，臺灣史研究的開展又與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潮流有

---

68 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臺北：正中書局，1954，1990再版），頁1。

69 張朋園在《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廷》的書中說道，費正清、韋慕廷之所以說服福特基金會幫助成立近史所，「原非厚愛於近史所，而是欲借基金會財力的扶持，充實近史所，以之作為美國在臺灣研究中國的基地」。見該書〈引言〉，頁1。

70 李國祁的「內地化」論點，主要見於氏著〈清季臺灣的政治近代史——開山撫番與建省（1875~1894）〉，《中華文化復興月刊》，8：12（1975），頁4~16；〈清代臺灣社會的轉型〉，《中華學報》，5：3（1978），頁131~159；《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9~1916》（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2），頁1860~19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這在年輕一輩學者的治學路向上有明顯表現，如當時剛剛涉入臺灣史研究領域的陳秋坤、林滿紅，其論文就有「相當濃厚的社會科學取向，而特別集中在經濟史方面」。他們在研究所期間，與人類學的研究生陳其南經常共同磋商，討論他們對臺灣研究的興趣。他們在不同的程度上，參與了由張光直領導的「濁大計劃」，並以此爲基礎寫就論文。[71] 由於這一計劃的開展，使得參加者和臺灣史的研究者的眼界由漢人社會擴大到所有臺灣的居民，注意到他們（族群）之間的關係，在此基礎上，陳其南首先提出了「土著化」的觀點，引出了上述李國祁的「內地化」觀點。

所謂漢人社會「土著化」的觀點，並不指漢人如何接受臺灣當地的土著文化，而是臺灣的移民如何在開發臺灣的過程中，逐漸發展出一種自主的意識，更多地認同臺灣而不是他們原來的出生地——中國大陸。其實稱之爲「本地化」似乎更爲恰當，也更符合陳其南所用的英文對應形容詞「native」。從陳其南對這一論點的描述中也可看出，他更注意的是如何從人類學的眼光來看待臺灣漢人移民社會的轉型，由此他分析的重點是所謂「祖籍意識」的變化。他的研究對象是宗族械鬥的多寡、祖先祭祀的方式和宗教信仰的變化等等。陳認爲臺灣到了十九世紀中期，已經逐漸「土著化」，漢人已經從移民的心態中擺脫了出來，不再看重自己原來的祖籍、神靈，也不再渡海爲自己遙遠的祖先祭祀了；促成這一轉變的主要社會機制是「村落的寺廟神和宗族組織」。[72]

但是這兩個觀點的不同，只是在解釋漢人社會的轉型問題上；陳其南也沒有否認那些臺灣移民所建立的還是一個「傳統中國社會」，正如他著作的標題所示。這與李國祁的「內地化」說法所得出的結論，並無二致。陳想處理的問題和對象，正如他自己所言，「比較狹隘，其目的只在於透過社會群體構成法則的變遷來解釋臺灣漢人社會在臺灣本土定著化的過程」。在另一處，他又解釋道：「『土著化』的理論基本

71 上引對陳、林兩人論文的評論，見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叢刊，1987），自序頁8~9。另見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頁10。

72 見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頁153~1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是一個人類學式的研究，主要是透過社會結構、族群關係和人群認同意識的分析來闡明清代臺灣漢人社會的轉型過程」。[73]因此，他理論的方法論價值顯然大於其本身的價值。從此以後，「認同」問題就進入了臺灣（史）研究的領域，成爲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這是陳其南著作的重要性所在。

但是，要想真正在臺灣史的研究中，對這一「認同」問題作深入的探討，還是要在1987年解嚴以後。自那時以來，雖然有不同的聲音和觀點，但就總體而言，臺灣史的研究已經帶上了民族史的意向。由此，臺灣的歷史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由於臺灣史的「本土化」傾向所致，也必然牽連到其它的歷史研究，特別是向來作爲臺灣史學界研究主流的中國史研究。換言之，在目前的臺灣史學界，幾乎所有的人都無法避免一個自我定位的問題，連作外國史的也不例外，因爲這一「本土化」的傾向，已經造成史學界所用術語的改變；一些習慣用法如「中西」、「中國人」等的含義都變得複雜起來了。

將1987年視爲臺灣史學史上的一個新階段，還帶有用政治來解釋歷史的傾向，自然有不夠妥當的地方。比如臺灣史的研究，在這以前，就有了蓬勃的發展。1983年以後，幾乎每年都有臺灣史研究的會議，由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77年成立）、《思與言》雜誌社、聯合報、臺灣史研究會（1987年成立）、臺灣大學、成功大學等單位舉辦。1986年，更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的成立，爲現今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前身。但是，雖然有這些研討會，但其內容還是表現出解嚴之前與之後的區別。在解嚴以前，研討會的內容大致從「最不敏感的史料著手」，「儘量避免政治性的爭議」，以後才「漸入探討影響戰後臺灣歷史發展的二二八民變」。[74]由此可見，臺灣政治的民主化，與臺灣史的開展和臺灣歷史學界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而這一民主化的過程，又是以1987年的解嚴爲突出標誌，由此來劃分一個階段，相對便利一些。

---

73 同上，頁180；頁160。

74 此處引語見張炎憲〈臺灣史研究的新精神〉，《建立臺灣的國民國家》，頁1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事實上，學術研究也無法與政治風雲完全分開。1987年解嚴以後的政治形勢，強有力地推動了臺灣史的研究，其表現爲立法院作爲臺灣社會的代言人，不斷敦促學界開展臺灣史的研究，在經費分配上慷慨支援，使得臺灣史的研究突飛猛進。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建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所及其前身——「臺灣史田野工作室」的成立，都主要是1987年以後的事情。而臺灣史研究所的建立，則與立法院的多次直接要求有關。相形之下，學界的動作還顯得比較保守、遲緩。[75]

儘管如此，自1987年以後臺灣學術界還是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其突出的標誌便是「本土意識」的加強。這一「本土意識」，在廣義上首先是相對西方而言的，以後才過渡到對臺灣的認同。如同上述，以史學界而言，余英時、黃進興、黃俊傑等人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便提醒學界人士不要一味迷戀西方的理論與方法。中研院民族所更有「社會科學中國化」的追求。按張隆志的分析，這一「中國化」的傾向與臺灣本土化的傾向有著傳承的關係，而1988年《臺灣社會研究》的創刊，則「預示著一個新的學術世代的展開及本土學術典範的形成」。[76]

在史學界，1990年創刊的《新史學》也有重大的意義。從形式和淵源上看，這一刊物的創辦與陶希聖的過世和《食貨》的停刊有關。停刊前的《食貨》雜誌，在其周圍已經有了一群具有相同志向、願意爲史學研究奉獻心力的年輕學者（以當時任教於東吳大學的杜正勝爲首），他們每月舉辦民間形式的「食貨討論會」，提出論文，切磋討論。《食貨》雜誌的停刊，促使他們有意創辦一新的史學刊物。[77]在杜正勝簡短的《新

75 參見該所出版的介紹資料《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簡史》，頁2~3。

76 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頁13~14。

77 黃寬重、沈松僑的回憶和與筆者的談話，1999年4月9日和12日於中央研究院。另見杜正勝的回憶：〈通貫禮與律的社會史家陶希聖〉，氏著《古典與現實之間》（臺北：三民叢刊，1996），頁235。「食貨討論會」自1979年開始以非正式的形式成立，成員來自臺北各個學校和中研院，也有一些人來自臺中、新竹。他們每月或每兩個月聚會一次，由一人提出專題報告，參加的成員共同討論，然後交《食貨》等專業雜誌發表。討論會在1982至1985年間頗為活躍。1985年成員黃寬重赴美進修，以後邢義田也去美國進修，討論會聚會次數開始減少。但在1986年成員們開始有意編寫一部「中國通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學》〈發刊詞〉中，他一方面提醒世人一個「新時代」的即將來臨，由此來論證「新史學」的必要；另一方面又希望同仁不要以「形式」區分「新」與「舊」，一味追求時髦的新理論、新方法。這種態度，正反映出杜和他的同仁們不願在西方理論和方法面前匍匐蹣跚的自主意識，與1980年代以來臺灣學界之潮流相應和。[78]

從《新史學》上所刊載的論文看，比較難以看出一個整體的傾向，與《食貨》復刊以後的明顯的社會科學傾向不同。這顯然體現了1990年代以來臺灣學術界逐漸走向多元的趨勢。其實這一學術界的趨勢，與臺灣社會本身的多元化和政治認同的多樣化是一致的。盧建榮在其新著《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中，就從人文學界的狀況分析了這一多元化趨勢。而江宜樺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則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將臺灣學界所討論的「認同」理論歸爲三大類。[79]他們的著作都是最新出版的，表明這一政治與學術多元化的趨勢，在臺灣正方興未艾。

不過，就《新史學》的主要創辦人杜正勝個人來說，他還是有一定的構想的，具體見於他在1992年發表的〈什麼是新社會史？〉一文。該文的題目就有兩個意思。首先，他所希望提倡的是一種「社會史」，這顯然與自1960年代以來臺灣史學界的主導傾向有關。雖然杜正勝本人對社會科學的理論，興趣一直不太大，但他在各種場合，對倡導史學社會科學化的許倬雲，向來十分肯定，認爲許的研究取向「從近代中國社會

因此改名為「國史討論會」，並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和劉子健提供參考意見。「食貨討論會」的主要成員又參加了《食貨》雜誌後期的編輯工作，如黃寬重、沈松僑、李達嘉、陳華、張榮芳和劉增貴。在《食貨》於1986年停刊以後，他們在最後一期上發表〈本刊啟事〉，表示惋惜之意。因此有1990年《新史學》刊物的創辦。筆者感謝黃寬重允許閱讀他個人保存的「食貨討論會」、「國史討論會」記錄資料。有關《新史學》創辦的資料藏《新史學》編輯部，現設在中研院史語所。

78 〈發刊詞〉，《新史學》，1：1（1990.3），頁1~4。

79 盧著由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年出版；江著由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於1998年出版。江的劃分法見頁138以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學來看是頗有意義的」。[80]而杜本人對中國上古史的研究，特別是他在《編戶齊民》中的研究方向，與當時的社會史取向，還是存在某種聯繫。其次，杜所強調的是「新」，是一種「新社會史」。易言之，他既然對理論興趣闕如，而又樂意從事社會史的研究，那麼他所追求的自然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新」社會史了。這一「新社會史」就是要在一般社會史研究的範圍之外，再加上「人民生活、禮俗、信仰和心態的部分」，而這部分研究的材料來源就是「類書、筆記小說、古禮經說、札記」。

如同杜正勝在文中承認的那樣，他的「新社會史」的想法，受到了法國年鑑學派的啓發。但從他對這一「新社會史」的界定來看，則又是以中國文化傳統爲基礎的。他吸收了年鑑學派的「整體史」(totalhistory)的概念，希圖將對人的活動的研究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來入手，但在研究重點上，則以普通民眾的生活爲主。[81]這一「新社會史」，既突破了原來的政治、軍事史的傳統，結合了社會史的潮流，又以其幾乎「無所不包」的範圍，容括了原來的傳統史學。用杜正勝自己的話說就是：「所謂新社會史是以過去歷史研究所重視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和生產方式爲骨幹，傅益著人的生活和心態，使歷史學成爲有骨有肉、有血有情的知識」。[82]換言之，「新史學」以傳統史學爲基礎，是其在社會層面的擴大。因此，《新史學》雜誌的論文題目如此廣泛，也就不足爲怪了。

但是《新史學》雜誌的學術寬容度並不能代表1990年代以來的臺灣史學界、學術界的氣氛。臺灣學術界和臺灣社會的多元化趨勢，正是基

80 杜正勝在最近去哈佛大學（1999年3月24日）「楊聯陞紀念講座」所作的「一個臺灣觀點的中國古代史研究」中聲稱：「我是許先生的學生，受他多方面的影響，但我對當時流行的社會科學方法並不熟練，也沒有太大興趣，所以我的古史著作很少有這方面的痕跡」。筆者感謝杜正勝將此未刊稿承示。杜對許倬雲的評語見〈學術與現實之間——許倬雲的省思和關懷〉，氏著《古典與現實之間》（臺北：三民書局，1996），頁254。

81 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3：4（1992.12），頁95~116。

82 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討小組的成果〉，《新史學》，6：1（1995.3），頁1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各種學派、觀點和思想的紛陳及其所引起的爭論，而不是一團和氣的「和平共處」。自1990年代以來，這些不同觀點之間所引起的爭論，可以說是此伏彼起。由於觀點不同而導致學術團體的分裂和新學會的成立，也是層出不窮。如在1994年到1995年間，就有「臺灣政治學會」、「臺灣歷史學會」和「臺灣社會學會」的成立，與以前有的、以「中國」命名的學會相抗衡。而在臺灣史研究的領域，已經有了以王曉波、尹章義爲核心的「臺灣史研究會」。但在政治認同上，「臺灣歷史學會」和「臺灣史研究會」處於對立的狀態，前者追求具有「臺灣主體性的歷史觀」，而後者則傾向於注重臺灣史研究的中國框架，並注意大陸臺灣史研究者的成果。[83]

「臺灣歷史學會」所謂「臺灣主體性的歷史觀」，在該會成員對「光復節」的批評上可見一斑。1945年10月25日國民黨在日本戰敗以後以中國政府的身份收復臺灣，是「光復節」的來由。但對此「光復」，「臺灣歷史學會」提出質疑，並在1995年10月21日召開「尋找十月二十五日的歷史定位座談會」，集中闡述他們的觀點。他們認爲，臺灣爲盟軍所戰敗，不值得慶祝。如果要慶祝的話，也只能慶祝戰爭的結束，而不是「光復」。這種立場，其基本態度就是視臺灣爲日本歷史的一部分，而將清代統治臺灣的歷史（或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歷史淵源）排除在外。雖然這是在討論一個有關歷史的問題，但其問題意識則來自現實，即對1945年以來國民黨統治臺灣（特別是1987年解嚴以前的國民黨）所表示的一種不滿情緒。更主要的是，這一「臺灣主體性的歷史觀」反映了臺灣社會和民眾尋求一種新的國族認同的願望。這一尋求，與1971年以來中共政府國際地位的日益上昇，臺灣民眾和政府所受到的壓力和威脅的日漸增大，原有的「大中國」或「正統中國」的認同意識逐漸消失等都直接有關。[84]

---

83 「臺灣歷史學會」出版有《臺灣歷史學會通訊》，集中反映了該會的立場。而「臺灣史研究會」則出版有《臺灣史研究會論文集》三集。

84 有關臺灣最近有關一些抗戰節日所引起的爭論，參見張瑞德〈紀念與政治——臺海兩岸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比較〉，收入《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是，就目前的狀況來看，這種對新的認同的追求還在進行之中，遠還沒有達到共識。上面有關「光復節」的例子，代表的是一個比較激進的觀點。而就社會涉及面和爭論的重要性來看，當屬1997年有關臺灣初級中學教科書的事件。這一事件的主角是現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杜正勝，因爲他負責主編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的「社會篇」。而他又是歷史學家，在這之前還提出了所謂「同心圓史觀」，因此成爲《認識臺灣》教科書批評者的主要攻擊對象。[85]作爲一個歷史學家，杜正勝深深明白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之間的緊密關係。他說：「在現代知識分類中，歷史學應該屬於最可能反映現實社會的一種知識」。由於這個緣故，杜指出，過去的「大中國主義」的歷史教育，受到了政治形勢和意識型態的干擾，沒有反映臺灣在現代國際關係上和世界歷史上的正確位置，而是與中國大陸硬綁在一起。這種歷史教育，違反了歷史的「真相」；因爲在他看來，雖然歷史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還是爲了展現歷史的真相。不過在這同時，他又寫道：「我常常感嘆臺灣『國不成國』，政治民主化及言論絕對自由，並沒使臺灣更加團結以對付共同的敵人，反而給臺灣帶來更大的混亂」。[86]由此看來，他還是希望歷史教育能結合現實政治的需要，也即在建立臺灣國族認同的基礎上重新解釋歷史，取代國民黨政府以前提倡的以中國爲核心的民族主義。

爲此目的，杜正勝提出了「同心圓史觀」，其中心問題是如何立足臺灣，看待臺灣與外界的歷史聯繫。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由近及遠，從今溯古」。這一「同心圓」由四圈組成，第一圈是鄉土史，第二圈是臺灣史，第三圈是中國史，第四圈是亞洲史，然後第五圈是世界史。[87]這一歷史觀，與以前認同中華民族的歷史觀相比，呈現出一種開放、

文集》（臺北國史館，1998），頁1075~1138。

85 杜正勝自認與這次爭論「息息相關，甚至是以我為核心」。此言不差。見〈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臺灣歷史教科書風波的分析〉，收入氏著《臺灣心、臺灣魂》（臺北：河畔出版社，1998），頁157。

86 同上，頁149~161。

87 杜正勝〈歷史教育的改造〉，同上，頁141~1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層的性質，在歷史觀念上力圖反映臺灣社會本身的多元化和臺灣與外界的多重關係。但是，顧名思義，這一「同心圓」歸根結底還是有一個「同心」的，因此還是具有鮮明的國族史學的一元論傾向。

也許是這個原因，根據這一「同心圓史觀」寫作的《認識臺灣》教科書一完成，便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據杜正勝自己的初步統計，就有「新聞報導超過二百五十則，社論十八篇，專欄一百篇，還有臺灣流行的讀者投書也將近兩百篇。以上資料只限於公開發行的報紙，電子媒體如電視、廣播的評論和辯論，聽眾call in，以及個別的信函和傳單尚未計算在內」。他自己也感嘆道，這麼多的資料足夠寫一篇博士論文。[88]

不過，雖然資料繁多、觀點紛雜，但就爭論焦點來說，無非是有關臺灣的認同問題。換言之，杜正勝提出「同心圓」，自然也希望臺灣社會能夠「同心」對外，也即中共，但臺灣社會在目前呈現出來的趨勢，卻不是一個「同心」兩字可以形容或概括的。臺灣目前存在的複雜的族群關係及其分化組合的暫時性（temporality），已經無法用傳統民族史學的規範來解釋了。如果我們把臺灣的族群關係比作一個多彩的光譜（spectrum），其暫時性就表現爲在幾乎任何一個時刻，由於某一政治或文化事件，這一光譜就會重新排位，變化出不同顏色的組合。因此，有人甚至已經開始倡導一種「後國家」的概念。[89]

事實上，從《認識臺灣》作者所劃分的「族群」來看，就已經表現出一種社會多元化的特色。該書「社會篇」與「歷史篇」的作者都認爲，臺灣目前有四大族群，即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和新住民，而不願採用以往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籠統劃分，也放棄了一般通用的外省人、本省人和原住民的三分法。這一新的「族群」概念和族群的劃分，其形成

88 杜正勝〈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同上，頁158~159。有關這次爭論，報章雜誌開闢專欄討論，如《自由時報》（1997.6.16）；《聯合報》（1997.8.10）；《新新聞》，542（1997.7.27~8.2）和《當代》，120（1997.8.1）。

89 對此評論可參見廖炳惠〈族群與民族主義〉，收入《臺灣民族主義》，施正鋒編（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101~1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基礎並不穩定，既想考慮政治態度上的差異，又想反映語言和生活習慣上的不同。但即便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還是經常根據不同的場合，採用原來的劃分方法，顯示臺灣社會構成光譜的瞬息萬變。

杜正勝在解釋他主編教科書的宗旨時說，他的立場「只有一點，那就是認同臺灣」。[90]但問題在許多人看來，並不在於人們想不想認同臺灣，而是如何認同的問題。臺灣是民主化了的社會，也即人民是臺灣的主人，但人民只不過是一個抽象的、甚至想象的概念；具體的人民是由上述複雜多變的族群關係組成的。認同臺灣的問題於是就變成一個在什麼時刻認同什麼族群的問題。圍繞歷史教科書的爭論，正好反映出族群之間形成共識的困難。[91]

這一困難，集中體現在幾個有關臺灣史的問題上。首先是如何處理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歷史聯繫。教科書的作者一反過去連橫《臺灣通史》和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的說法，將臺灣史的開端與中華文明相隔離，而把這一聯繫設定在鄭成功來臺之後。在這以前臺灣史的階段爲「史前文明」和「國際競爭時期」。在「國際競爭時期」（1600~1662），漢人也與日本人相提並論，不分軒輊。這一時期的設定，顯然是爲了照應當今臺灣社會的多元性，從歷史的角度證明臺灣具有「多元文化的社會、對外關係的密切、國際貿易的興盛和冒險奮鬥的精神」的特色，以顯示臺灣與中華農業文明的區別。

要想重新認識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歷史聯繫，就必然要牽涉到臺灣與日本的關係；這是臺灣史解釋的另一個重要問題。由於臺灣的歷史上，與其發生長期和緊密聯繫的只有中國大陸和日本，因此要疏遠一方，就必然會親近另一方。教科書的批評者所不滿的，正是《認識臺灣》在日本統治臺灣上的看法。雖然《認識臺灣．歷史篇》的主編黃秀政和作者吳文星力圖保持「客觀中立」，[92]既描述了臺灣居民在日本進入臺

90 杜正勝〈從根扎起，認同這塊土地〉，《自由時報》1997年7月6日9版。

91 日本臺灣史專家若林正丈對此有不少論述，見氏著《臺灣：分裂國家と民主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

92 見吳文星於《聯合報》1997年6月18日11版的投書和黃秀政於《中國時報》1997年6月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灣以後的抗日活動，但也介紹了日本在臺灣的經濟和文教建設，因此無法讓敵視日本殖民主義的批評者滿意。事實上，正如盧建榮注意到的那樣，《認識臺灣》教科書將日本與中國政府（鄭成功、清朝和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各打五十大板的作法，已經讓一些日本人感到臺灣人開始重新、正面評價日本殖民主義了。[93]因此對教科書的評價，其牽涉的問題遠在書的本身之外，有複雜的歷史淵源和國際政治背景。

正是這些背景的存在，造成臺灣族群關係的多樣化和國族認同問題上的不一致。由教科書的爭論我們可以看出，要想對臺灣歷史的演變提出一種解釋，殊大不易。事實上，就臺灣社會的多元化程度來看，由一個官方機關（國立編譯館）出面編寫歷史教科書的作法，已經有點過時了。美國有關中學歷史教科書大綱（僅是大綱而已）的爭論，也反映出在現代多元國家中，已經無法形成一種讓所有人滿意的歷史解釋了。[94]傳統民族史學的路向，通常是以樹立一個固定的「它者」（the Other）作爲對比的參照框架來建構一個民族的歷史，而且這「它者」往往就存在於內部。但在現代社會，由於快速的生活節奏和多變的政治情勢，加上民主制的普及，使得族群關係、兩性關係變得日益多樣複雜，已經無法再從一個社會的內部找出一個固定的「它者」作爲參照的對象了。

其實，沒有一個一統的歷史解釋，非但不會阻礙史學研究的進步，反而能促進其繁榮。臺灣史研究自1980年代以來的長足進展，就是一個顯例。在這一蓬勃的臺灣史研究的場面之下，我們能見到不同的觀點、聽到不同的聲音。我並沒有故意在這裡對臺灣史研究者作分門別類的劃分，因爲這些劃分就像臺灣現有的族群關係一樣，可以說是一個瞬息萬

日11版的投書。

93 盧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9），頁277~278。

94 1995年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出版了從幼稚園到高中的歷史教學大綱，但因為突出了少數族群的歷史作用，使得一些白人對之不滿，引起爭論，最後稍作修改了事。張四德曾撰有〈種族意識、史學研究與歷史教科書的編撰：以美國為例〉，收入張元、周樑楷主編的《方法論：歷史意識與歷史教科書的分析編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頁347~364。張文沒有觸及1995年的那場爭論，但從中可見在美國有關歷史教科書的爭論，由來已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變的光譜。很顯然的，王曉波、尹章義等人的研究，就與張炎憲、吳密察等人不同，也和黃秀政、吳文星有差異，而後者又與周婉窈、許雪姬、林滿紅等人存在差別。作爲老一代的學者，曹永和與黃富三的研究又別具一格。上述這些人還都是以臺灣史研究成名的。至於在1990年代以後、用回饋鄉土的心情轉做一點臺灣史的，其研究路數更有差別，如杜正勝、黃俊傑、林富士等人。[95]在這以外，還有作爲民進黨「史家」的陳芳明，其學術影響也不可小覷。臺灣史的研究能展現如此眾多的「學派」，難怪年輕學子會趨之若鶩了。從目前的狀況來看，臺灣史作爲臺灣史學界「顯學」的位置，正蒸蒸日上、氣勢旺盛。[96]臺灣社會多元化的局面，在臺灣史研究上得到了明顯的反映。

四、餘　　論

從上述對臺灣史學發展三個階段的描述與分析，筆者希望爲臺灣史學史勾勒出一個曲折複雜的過程。這一過程的特點，已經由本文的題目點出了，即「變」與「不變」之間的辯證關係。近代西方一位賢哲說過，史學是時代精神的反照。臺灣自1949年以來，經歷了許多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上的變化，這些變化自然會反映在史學研究中，構成一個時期

95 杜正勝有〈到臺灣之路〉，記錄他如何逐漸認識到自己應該研究一些臺灣史的心路歷程，《自由時報》1999年1月10日副刊。林富士在與筆者1999年4月21日的談話中，也講述了他感到有必要回饋鄉土的心情。

96 彭明輝最近做了一個量化的研究，將臺灣各史學研究所博、碩士論文的題目加以總結分析，證實臺灣史研究為1990年代以來的「新顯學」。「1994年臺灣史碩、博士論文所占比例，首次超過傳統的熱門領域—中國近、現代史」。見氏著〈臺灣地區的歷史教學與研究，1945~1995〉，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成立四十週年「四十年來臺灣人文教育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1998年12月19日。筆者感謝彭明輝將論文承示。梁其姿1999年在〈歷史學門成就評估報告〉中也說臺灣史研究「有可能異軍突起」。見《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1（1999.1），頁24。有關臺灣史研究的一般概況，日本學者若林正丈編有《臺灣臺灣史研究——制度、環境、成果：1986~1995》（東京交流協會，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學研究的特色。本文對臺灣史學史三個時期的劃分，其目的就是爲了展現這些變化所造成的時代特點。至於正確與否，唯有讀者才能評判。既然如此，我想就不必浪費筆墨，在這裡再對這些變遷作任何小結了。

可是，對於本文提出的臺灣史學史中的「不變」部分，我想還是有必要再作一些說明。任何變化，都是一個相對的東西。如果沒有不變的部分，也就無所謂變化了。如果我們將史料學派的研究路向視爲臺灣史學的開端，[97]那麼這一傳統在當今的臺灣史學界，仍然有其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見於兩個方面。第一是歷史觀念的部分；第二是史學方法的部分。從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著眼，傅斯年等人的史料學派似乎沒有很明顯的理論傾向，其實不然。史料學派對歷史真相的追求、對考證史料的重視，與民國初年的文化變遷有緊密的聯繫。傅斯年等人之所以推崇科學主義，正是由於他們這一代人認爲，中國以往的傳統中太不重視這一點，因此造成近代中國貧窮積弱的局面。因此，他們對真相、事實的崇敬，正是爲了建立民族史學的需要。易言之，科學主義也還是符合政治需要的。這點在西方近代史學的發展中，也同樣如此。西方史學界提倡科學史學的時候（十九世紀），正是西方國家殖民征服所向無敵的時期；他們以科學主義來告訴非西方的人士一個歷史的「真相」，那就是唯有遵循西方發展的路向，才能擺脫貧窮，在現代世界生存立足。於是，科學主義與民族主義相互攜手，主導了二十世紀史學研究的世界性潮流。

臺灣史學的發展，一直朝著科學化的方向發展，而這一科學化傾向，又一直未能真正擺脫史料學派的模式。1960年代中期以來，社會科學予以史學以強大的衝擊，但持續十年以後，便開始爲人所不滿，加以反省。而反省的結果是尋求「社會科學的中國化」，也即把史料學派所代表的考證史學重新扶爲正統。1987年解嚴以後，臺灣社會日益走向多元化、國際化，於是有了重新認識歷史的需要。雖然各種探尋的結果和手段很不一樣，但史學應該揭示「歷史真相」的觀念，仍然有著吸引力。

97 似乎並沒有多少人會質疑臺灣史學研究開始於1940年代末期。上引杜正勝最近在哈佛的演講，「一個臺灣觀點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其中也承認這一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確，求真是史學研究的目的，這也是史料學派之所以綠樹常青的道理，因爲史學離不開史料。但求真的手段，並不應該是劃一的、永恆不變的。如果將史料的蒐集、排比、整理、批評作爲求真的唯一手段，實際上是貶低了史學研究的價值。事實上，由於最近幾十年來的變化，人們對史料本身的認識也比以前大大擴大了。那麼我們能否也將求真的目的，稍微放大一點，將一件歷史事件的考證，與歷史解釋相聯繫呢？從目前的狀況來看，人們的注意力還主要放在前一方面。就拿目前興旺發達的臺灣史研究來說，許多研究人員的精力，大都花在蒐集、整理史料的方面，而未能就臺灣史本身，提出深思熟慮的解釋。[98]這一局面的造成，與以往史學的研究傳統有關；人們總是認爲先有史料，方有史學，因此必須將整理史料的工作，放在首位。依筆者管見，對史學性質和方法的進一步思考，也許能促使史學家調整（prioritize）研究的重心，不再將自己束縛在補苴罅漏的藩籬裡面，也不再將歷史解釋的工作，拱手讓與政治學家或社會學家。由此方向，臺灣史學當會期待更長足的發展。

作者感謝臺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的獎助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幫助，使其能於1999年1月至7月在臺灣訪問。在訪問期間，作者就研究課題與下列人士有過交談，如陶晉生、李亦園、孫同勛、杜正勝、黃寬重、邢義田、古偉瀛、黃進興、黃俊傑、蕭璠、王汎森、張瑞德、林富士、陳弱水、周婉窈、盧建榮、梁其姿、黃榮村、黃克武、沈松僑、鄧世安、祝平一、張隆志、蔣竹山、潘光哲等，特此致謝。另外，作者也感謝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的顏淦地及其同事在提供資料上予以的幫助。在本文修改的過程中，筆者又曾獲得余英時、許倬雲的指點，獲益良多。臺大歷史學報的審稿人也提了十分有益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並表示衷心感謝。

（責任編輯：王俊中　　校對：林佳潔）

98 由於臺灣史料的整理工作量很大，使得不少臺灣史家倦於應付、疲於奔命，無法在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題目上投入更多的時間。據周婉窈、吳密察、張隆志等人與筆者的談話，1999年4月2日，14日和6月16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Historical Studies in Taiwan, 1949-1999

Q. Edward Wang

Abstract

The end of World War 2 ushered in a new era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It also marked a new beginning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aiwan. The defeat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forced many top-notch Chinese historians to retreat to the island. These Chinese scholars helped form a long lasting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 in Taiwan, emphasizing source criticism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nd extend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alled "historical source school" (*Shiliao xuepai*) that appeare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eginning in the mid-1960s and armed with their knowledge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s they learned from/in the West, Taiwan historians of a new generation sought an alliance between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attempted new methods in research which utilized the quantitative approach and theoretical contemplation. However, by the end of the 1970s this zest for social sciences gradually cooled down; empirical methods on source criticism regained their attraction. All the same, the social science orientation left an important legacy for Taiwan historians in the 1980s. Their studies were no longer confined to topics lik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great ideas that had intrigued their teachers. Social history in a broad sense became a major trend which helped extend their interest into Taiwan. ?

Since 1987 when the government finally lifted martial law, the study of Taiwan history boomed, gaining a tremendous popularity. Taiwan historians were now interested in knowing what has been going on around them on the island and eager to re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island for building a new na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olitical uncertainties at home and abroad, however, have prevented them from forming a consensus among themselves as well as with the island's residents.

Keywords: History, Taiwan, Taiwan studies, Historiograph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